

汉代经方的源流及与医经的融合

顾 漫 柳长华* 罗 琼

(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, 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, 100700)

* 通讯作者: liuchanghua⁰¹⁰@sina.com, (010) 84019861

[摘要] 汉代在中医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时期, 西汉末年刘向、刘歆、李柱国对方技类文献的整理分类, 在中医古籍整理和学术传承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中医学分为医经、经方两大系, 实亦上承东方针灸脉学(伏羲)与西方本草药学(神农)之遗绪, 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与技术传统。至东汉末年, 张仲景“勤求古训、博采众方”, 并“平脉辨证”, 实现了医经与经方两家之学的融合。从李柱国校方技到张仲景撰新书, 正是医经与经方由分到合的发展历程。这一历程, 肇端于岐黄, 至张仲景而能集其大成, 从而奠定了今日中医学的基本面貌。

[关键词] 《汉书·艺文志》; 医经; 经方

汉代是中医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时期, 中医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如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等几乎都成书于两汉四百余年期间。在此期间, 西汉末年刘向、刘歆、李柱国对方技类文献的整理分类恰可视为一个居中的分水岭, 在中医古籍整理和学术传承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

者, 否认中医的科学性, 视中医为非科学, 甚至是“伪科学”, 全盘否定和抛弃。这种观点之荒谬毋庸置疑。二是否认中医缺陷与不足, 视中医为圣贤古训, 全盘接受, 反对变革。尤其是对于诸如阴阳五行等核心理论, 更要固守, 不能变革。三是鸵鸟式态度, 消极对待, 像鸵鸟遇到困难把头钻到沙子里一样, 无视困境的存在, 任其自生自灭。面对 21 世纪的各种医学挑战, 中医该何去何从?

中医学是一门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医学体系, 它既包含对人类生命健康及其疾病规律的真理把握, 也夹杂有一些牵强附会、甚至荒谬的内容, 既有客观性、真理性, 又有相对性、局限性。面对这个并非完美的医学体系, 我们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, 全面加强中医学的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, 在与现代医学的比较中, 全面分析认识其学科特点, 把握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精髓, 认识中医药特色优势与不足, 明确继承中医的真正内涵。其次, 坚持辩证否定观, 摒弃因循守旧的保守心态, 要有与传统糟粕决裂的勇气。最后, 要有宽容开放的学术心态。中医理论的科学研究属学术研究范畴, 不能把学术问题政治化、伦理化, 不能用感情代替理性, 用文化解释科学, 科学不相信同情和眼泪, 别让中医承受不能承受

从两汉之际李柱国对于医经与经方的划分, 至东汉末年张仲景对于两者的融合, 体现了中医学主流的演变与发展。

1 西汉时期方技类文献的整理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·序》及“方技略”所述, 侍医李柱国负责医书(当时总括其名曰“方技”)的校理工

之重。中医作为科学必须批判创新, 作为文化则应该完整保存。有些人把中医阴阳五行思想视若神明, 设立研究禁区, 显然不是科学研究态度。邓铁涛先生则主张, 中医的五行学说并能不停留在《黄帝内经》的时代, 需要发展, 生克制化规律迄今已是“名实不符”, 五行学说应该证明为“五脏相关学说”^[3]。同时中医研究不仅是中医界内的事情, 还要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支持。因此, 中医学现代研究应保持系统的开放性, 吸纳其他学科的先进知识和技术, 并接受古代汉语、古代以及现代哲学、系统科学、数学、计算机学以及植物学等其他学科的渗透和参与。在虚心学习与吸收现代医学以及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, 不断完善中医理论、改进中医研究方法、规范诊疗手段与技术, 在创新变革中实现中医学的时代重建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何裕民. 爱上中医[M]. 北京: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, 2007: 99.
- [2] 赵敦华.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1: 202-204, 207.
- [3] 区结成. 当中医遇上西医[M]. 北京: 三联书店, 2005: 112.

©1994-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(收稿日期: 2011-02-15; 修回日期: 2011-03-20)

[编辑: 黄 健]

作。方技一类,若非专官世业,则不能胜任,可见汉代校书亦重术业之专精。当时所存之医书尚多,依例相校而除重复之后,计分为医经七家,二百一十六卷;经方十一家,二百七十四卷;房中八家,一百八十六卷;神仙十家,二百五卷。李柱国校方技书,既属于刘向等校书活动之一部分,自然亦当依统一之步骤及体例。首先合中外之本,辨其学术源流,相校而除去重复;其篇卷之多寡、次序之先后,皆出重定,与通行之本不同,故别立书名;每一书校毕,即撰叙录奏上,叙录则前列篇目,后论旨意。后班固删取《七略》之要,以为《艺文志》。

明白刘向、李柱国校书之体例,方可拨云见日,了解中医学术经此一关键期之源流变迁。由《汉书·艺文志》对医经的著录可以推论,西汉以前本无《黄帝内经》之名,至李柱国奉诏整理校定方技之书,始有其名。那么《黄帝内经》当出于李柱国手定,书名也是其新定。西汉以前,存世的书籍多是单篇别行,且不题撰者。刘向等部次群书,六略中皆称某某家,其义乃就其书以考其学术流别,并辨其出于某家之学,遂著录之。当时题名黄帝或内容涉及黄帝者,统为一家,皆定著为《黄帝内经》和《黄帝外经》;题名与内容涉及扁鹊者,统为一家,定著为《扁鹊内经》和《扁鹊外经》;大量没有题名的统为一家,著为《白氏内经》、《白氏外经》和《旁篇》。汉以前,医家著述多标其学出于黄帝、扁鹊,以为正宗者。但亦有申述医理而不题名者。李柱国编次,不辨其出于某家,遂题名白氏。是白氏之义,恐即无名氏之义。后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大量没有题名的医书,当是此种书之传者。医经虽称七家,实则三家而已。检《汉志》所载书目之例,每一提行为一家。如《易经》十二篇,施、孟、梁丘三家一行,即一家也。由此可知,医经、经方的著录,即以学术的内容不同而分家,并以题名的不同而类其书,是则李柱国所整理著录之书多与实际流传之书名不合^[1]。

2 医经与经方之义

2.1 医经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技序》所云,医经所论述的是人的阴阳脏腑、经络俞穴、血脉骨髓、疾病、诊法、治疗等,以及如何使用针砭汤熨,如何处方用药的理论。

晚周秦汉的经,不仅是指常诵之书或常道之书。医有医经、法有法经、数术家有星经,……这种种称经之例,经有尊贵之书或各家权威著作之意^[2]。医经

属于医学理论,应与生理学、病理学和诊断学有关。其中尤以脉学为最重要。而治疗方法则包括各种外治法和方剂学^[3]。

医经的内容对于各种诊疗技术具有统摄作用,而脉学在当时的医学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(序中首先标举的就是血脉,却不见提到脏腑,值得注意)。其内容包罗甚广,并与阴阳数术有密切关系,包含了古人所认识的“天人之道”。正如李茂如先生所论:“医经一门,包罗学科甚广。举凡推原天人之道,人身血脉经络脏腑阴阳之用,百病始生之本,针砭洗熨之施,以及百药调和之宜,胥隶此门”^[4]。

2.2 经方

依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技序》对经方之定义可知,经方亦是医学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《方技略》中所以有别于医经而别为一种,是经方本为治某某病方,人们可以持以治病,并且流传广,内容多,《经方》十一家的内容明显多于医经,恐怕也只是医方的一部分,所以别为一种。

所谓经方,当即指临证治病之方。古人用方多强调“经用”、“已验”,与今人重视药品的疗效、安全性并无二致。古人制方之法,还特别讲究气味的调和(“辨五苦六辛”),以及制剂的工艺(“致水火之齐”),这一点从存世的经方文献中不难得到证明。经方的知识主要来源于经验的积累,随着时代推移、经验累积日增,自然后出益繁,不断新陈代谢。

2.3 医经与经方的关系

医经与经方之分,颇如“道”与“器”、“学”与“术”,各有理论与方法的侧重。章学诚《校讎通义》中说: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,善法具举,本末兼该,部次相从,有伦有脊,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,会偏而得全,则任宏之校兵书,李柱国之校方技,庶几近之。其他四略,未能称是。故刘《略》班《志》,不免贻人口实也。夫《兵书略》中孙吴诸书,与《方技略》中内外诸经,即诸子略中一家之言,所谓形而上之道也;《兵书略》中形势、阴阳、技巧三条,与《方技略》中经方、房中、神仙三条,皆著法术名数,所谓形而下之器也。任、李二家,部次先后,体用分明,能使不知其学者,观其部录,亦可了然而窥其统要,此专官守书之明效也。”^[5]章学诚把书籍分为阐述理论和方法的两大类,在每一大类中,讲理论的书放在前边,讲方法的书籍依次排类,这种排列方法,大致符合《方技略》著录之例^[1]。

3 经方的源流

3.1 经方之源——伊尹制汤液

最先指出汤液出于伊尹的,是晋代学者皇甫谧。其《针灸甲乙经·序》云:“伊尹以元圣之才,撰用《神农本草》,以为《汤液》。”后世学者亦多遵信之。如宋代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云:“医经传于世者多矣。原百病之起愈者,本乎黄帝;辨百药之味性者,本乎神农;汤液则称伊尹。”^[6]孙思邈《千金翼方·序》亦云:“昔神农遍尝百药,以辨五苦六辛之味,逮伊尹而汤液之剂备。”

伊尹为商代著名的贤相,曾辅汤灭夏。而伊尹之所以得到商汤赏识且被委以重任,是因为他曾“以滋味说汤”(《史记·殷本纪》),即以调和五味为喻,向商汤陈说治国平天下之道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记载了伊尹“说汤以至味”的谈话,其中谈到“凡味之本,水最为始。五味三材,九沸九变,火为之纪。时疾时徐,灭腥去臊除膻,必以其胜,无失其理。调和之事,必以甘酸苦辛咸,先后多少,其齐甚微,皆有自起。鼎中之变,精妙微纤,口弗能言,志不能喻”^[7]。在烹调过程中对五味调和的重视、对水、火、木“三材”的讲究,恰与《汉志》经方序所云“辨五苦六辛,致水火之齐”的思路如出一辙。可见古人很早就认为汤液制剂之理与烹调之理相通,关键都在于一个“和”字——“和实生物”,能导致微妙复杂的变化(“鼎中之变,精妙微纤,口弗能言,志不能喻”),并因此将烹饪与汤剂的宗师归于商代的圣相伊尹。皇甫谧之说,应该不会出于一己之杜撰,想必有当时的民间传说或文献史料为依据(《汉志》所载的《汤液经法》及其他一些伊尹之书当时还行世,并为皇甫谧所见之可能性是很大的)。

3.2 经方之流——从《汤液经法》到张仲景医方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经方类”著录有“《汤液经法》三十二卷”,汉以后史志书目即不见著录,传世医籍中亦罕有引录。然近代于敦煌发现的卷子佚书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》(以下简称《辅行诀》),保存有《汤液经法》的部分遗文,使今人有幸重窥这部沉寂千载的古经方著作之吉光片羽,对于研究古经方源流甚为可贵。

张仲景《伤寒论·序》云:“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。”既曰“博采”,可见其方皆有渊源,并非纯然自造。然所采之方,究竟出自何处,张仲景惜未明言。皇甫谧在《针灸甲乙经·序》中最早述及张仲景学术与“伊尹《汤液》”的渊源关系:“仲景论广《伊尹汤液》为

十数卷,用之多验。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,皆可施用。”林亿《伤寒论·序》亦承其说:“夫《伤寒论》盖祖述大圣人之意,诸家莫其伦拟,故晋皇甫谧序《甲乙经》云:伊尹以元圣之才,撰用《神农本草》以为《汤液》,汉张仲景论广《汤液》为十数卷,用之多验。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,皆可施用。是仲景本伊尹之法,伊尹本神农之经,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”。

《辅行诀》的发现更为此说提供了有力佐证,书中明确提到:“汉晋以还,诸名医辈张机、卫汛、华元化、吴普、皇甫玄晏、支法师、葛稚川、范将军等,皆当代名贤,咸师式此《汤液经法》”。又云:“外感天行,经方之治,有二旦、六神(辑校本作‘四神’)大小等汤。昔南阳张机,依此诸方,撰为《伤寒论》一部,疗治明悉,后学咸尊奉之”,并指出:“张机撰《伤寒论》,避道家之称,故其方皆非正名也,但以某药名之,以推主为识之义耳”^[8]。陶弘景之说,明白不过地指示出张仲景学术于《汤液经法》之承传。

今将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之方与《辅行诀》所载“经方”(特别是“二旦、六神大小汤”)加以对照,确实可见较为清晰的源流关系^[9]。钱超尘先生亦指出:“《辅行诀》所载张仲景13首方,其药量药味有些与宋本不同。据陶弘景所云,这些不同,乃张仲景根据病情和他自己的医疗经验所增减。……依此观之,《辅行诀》引用之张仲景方13首,乃求其原始出处者,即引自《汤液经法》。《伤寒论》对诸方药量药味之增减,主要出自张仲景本人。此即皇甫谧《甲乙经序》所云‘论广’之一端。”^[10]张灿理先生也认为,《辅行诀》的发现“说明张仲景方之前,已有诸多有名方存世,其见载之医籍,疑即《汤液经法》”,“从现有古代文献角度而论,《汤液经法》一书应系有名医方之祖,为医方之源,张仲景医方,有诸多继承前人者,为流也”^[11]。

4 医经与经方的融合

4.1 汉代的医经与经方本是各自承传之学术体系

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,可知中国古代医学自有文献记载以来,即可分为医经、经方两大系,此亦上承先世伏羲、神农两系之遗绪,《素问·著至教论》:“上通神农,著至教,疑(拟)于二皇”。杨上善注云:“雷公所愿,立天之道,以章经术,益明后代,上通神农至教,拟于古之伏羲、神农二皇大道也。”^[12]根据“伏羲制九针”(《帝王世纪》)和“神农尝百草”(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)的传说,伏羲与神农分别代表了针灸脉学(东方)与本草药学(西方)的不同医学传统,

此为后来医经与经方之源头。而医经与经方各有其不同的理论与技术特征,医经更偏于理论探讨,经方略重于经验积累。且一系之中,复有诸家之不同(如“医经”有黄帝、扁鹊、白氏三家),正如李茂如先生所指出:“家之为言,自非仅指一目之书。盖谓其学有师承,术有专精也。是可略见汉代医学品流之繁盛”^[13]。亦可证谢观先生“两汉为中国医学专门传授期”之说。

医经与经方两系之传承不同,在后世医家的著述中亦可寻见佐证。如皇甫谧《针灸甲乙经·序》云:“夫医道所兴,其来久矣。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。黄帝咨访岐伯、伯高、少俞之徒,内考五脏六腑,外综经络血气色候,参之天地,验之人物,本性命,穷神极变,而针道生焉。其论至妙,雷公受业传之于后。伊尹以亚圣之才,撰用《神农本草》以为汤液。”^[14]孙思邈《千金翼方》卷第二十六《针灸上·取孔穴法第一》则云:“窃闻寻古人,伊尹汤液,依用炎农本草;扁鹊针灸,一准黄帝雷公,……夫欲行针者,必准轩辕正经;用药者,须依《神农本草》。”^[15]寻其文义,是皆以“黄帝—雷公—扁鹊”和“神农—伊尹”为两系,分别代表了针灸脉学与本草汤液。可见魏晋至隋唐时期医家中的饱学之士如皇甫谧、孙思邈等,由于去古未远、文献可征,对于古代医学“医经”与“经方”之不同传统及其源流,还是深悉洞明的。

如前所述,脉学从学术源流上乃属于“医经”一系,代表的是黄帝—岐伯的传统,临床上主要用于指导针灸等外治法(“针石治其外”)的施用,两者密不可分。如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所强调的:“凡将用针,必先诊脉,视气之剧易,乃可以治也。”早期的经方则主要是按病施用,并不需要察脉辨证。遍检现今出土的汉以前经方类文献,如马王堆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、武威汉简《治百病方》等,其主治病证下也见不到关于脉象的记述。

4.2 张仲景对于融合医经与经方的贡献

张仲景号为医圣,所著《伤寒杂病论》也被誉为“群方之祖”,其在中医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冠绝古今。然从学术源流的角度看,其主要学术贡献则是融合了医经与经方。

古时医家论及张仲景之书,推为“方法兼备”之作:“昔人论医,谓前乎仲景,有法无方;后乎仲景,有方无法;方法具备,惟仲景此书”(方有执《伤寒论条辨·跋》)。实则已暗含仲景融医经之法与经方之方于一体之意,与直言仅相去一间而已。今人则已明言

点破,如“仲景药依《神农本草经》,方选伊尹所著的《汤液经法》,根据医经家脏腑经络气血营卫的理论,取法于《素问·热论》篇,以六经病为纲领,分论外感病证,设置了六经施治的框架系统,将理法方药一线贯穿,‘医经’与‘医方’融为一体”^[16]。但是张仲景是如何融合两家之学的,前人则论之未详,或未得其要。

依我们所见,张仲景对医经与经方的融合,主要是通过引入脉学来指导经方的临证施用,从而将医经与经方有机融为一体。张仲景对脉学的引入,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以脉诊结合辨证,以辨证指导用方,即所谓“平脉辨证”;二是六经辨证体系的创立。“平脉辨证”在中医学术史上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创举。其重大意义即在于以脉学为枢纽,打通了医经与经方,将各自分立的两个传统糅合在了一起,使之水乳交融、交相辉映。这种融合是如此之成功,以致后人一直难以窥破接合的痕迹,真可谓天衣无缝。

循着这一思路去寻检史料,就会发现其实前人对这一学术变迁并非不知情,而且早有述及。如陶弘景在《本草经集注·序录》中提到:“张仲景一部,最为众方之祖宗,又悉依本草。但其善诊脉,明气候,以意消息之耳。至于刳肠剖臆,刮骨续筋之法,乃别术所得,非神农家事。”^[17]从陶弘景著《本草经集注》及《辅行诀》可知,其人对于经方家之“家法”必是深知根底的。所以这里提到张仲景“最为众方之祖宗,又悉依本草”,认为其遵从“本草家意”,继承了经方的传统,应当是可信的。值得注意的是,陶弘景话锋一转,特别指出张仲景“善诊脉,明气候”,故能“以意消息之”,对旧有的成规定法有所突破和创新。实际上陶弘景这段话已经约略点明了张仲景是如何撰用医经、“论广《汤液》”,将二者结合并有所发展的。

中医文献学家杨绍伊先生在所著《伊尹汤液经》一书中,对“针灸家”(医经家)与“汤液家”(经方家)学术之不同已有辨识在先:“仲景为医中汤液家,汤液家举书不举《汤液经》而举《素问》,不数伊尹而数岐黄,何异家乘中不系祖祢而语东邻也。至其下之‘按寸不及尺,握手不及足,人迎趺阳,三部不参’云云,殊不知三部九候乃针灸家脉法,非汤液家脉法。针家刺在全身,誓不能不遍体考脉;汤液家重在现证,脉则但候其表里寒热、脏腑虚实、荣卫盛衰,以决其治之可汗、不可汗,可下、不可下而已,故诊一部亦已可定,不必遍体摩挲。以汤液家而用针灸家骂汤液家之语骂人,仲景纵亦精于针灸脉法,何至遽瞋督而

矛盾若是?”^[18]张仲景虽未必如杨绍伊先生所云为一纯粹“汤液家”，然其文中指出两家学术之不同在于“脉法”，诚为独具只眼，洞微发隐之论。

再来看“六经辨证”体系的创立。伤寒之“六经”取自《素问·热论》篇并有所发挥，前人已有定论。这也是张仲景“撰用《素问》”的明证。无论《伤寒论》中的“六经”是否全同于经脉学说之六条经脉，其辨证分型都要依据脉象是无疑的，观六经病各篇标题之“辨某某病脉证并治”及篇中“六经病提纲”即可得证。因此，亦当承认“脉学”在六经辨证体系创立中所发挥的作用。“脉—证—病—方”对应体系的建立，加强了“理、法、方、药”之间的联系，使中医临证处方的各个环节贯通一体。

唯今本《伤寒论》是否张仲景著作原貌，殊为难言。马继兴、钱超尘诸先生均认为，《伤寒论》的原始编次当是按“可与不可”排列的，而非今日所见之“三阴三阳”^[19]。钱超尘先生更通过考证认为，张仲景序中“撰用素问、九卷、八十一难、阴阳大论、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”23字为后人所加^[10]。若如此，似当推论医经与经方之融合，也非经张仲景之手便一蹴而就，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逐步完成的，其中王叔和之力尤不可等闲视之。然王叔和与张仲景关系实非同一般，其与张仲景弟子卫汛有交谊，于张仲景亦当有师承授受之渊源。

5 结论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“方技”分为医经、经方、房中、神仙四家，如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的状况，确为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”之典范。其中的医经与经方，上承东方针灸脉学(伏羲)与西方本草药学(神农)两系之遗绪，体现了不同的理论与技术传统，在汉时本是各自承传；医经与经方之融合，当归功于张仲景。张仲景通过“平脉辨证”，为医经与经方两学之间架起了一座“鹊桥”；两家之学融合的实现，实有赖于张仲景“勤求古训、博采众方”之创造性的“古籍整理”工作。张仲景在中医学学术史上之贡献，或可比拟于糅合今古文、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经学大师郑玄，其熔古开新之功，诚不可没。曹禾在《医学读书志》中称赞张仲景为“述而不作”，张灿理先生亦云：“如果说先秦时期，传世医书尚多以单篇别行的形式出现的话，而到了两汉时期，则经过官方或个人的整理，而发展为较多的综合性医书。……仲景之书，并非单纯地对已有医学文献的编辑，而是吸收已有文献，结合个人经验进行的整理工作”^[20]。从学术源流的角度看，从李柱

国校方技到张仲景撰新书，也正是一个医经与经方由分到合的发展历程。这一历程，肇端于“岐黄”医家的“拟于二皇”(伏羲、神农)，至张仲景而能集其大成，从而奠定了今日中医学的基本面貌。

参考文献

[1]柳长华.《汉书·艺文志》医经著录研究[J].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,1999(3):137-141.

[2]李建民.发现古脉——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[M].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7:54-56.

[3]李零.数术方技与古代思想的再认识[M].见:中国方术考.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0:22-23.

[4]李茂如.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医经、经方之著录[M].见:李茂如,胡天福,李若钧.历代史志书目著录医籍汇考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4:19.

[5]章学诚著,王重民通解.校雠通义通解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:48-49.

[6]晁公武撰.孙猛校证.郡斋读书志校证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:702.

[7]许维通撰,梁运华整理.吕氏春秋集释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9:313-314.

[8]马继兴,王淑民,陶广正,等.敦煌医药文献辑校[M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8:187,193.

[9]王淑民.敦煌卷子《辅行决用药法要》考[J].甘肃中医,1990,7(4):15-17,40.

[10]钱超尘.仲景论广《伊尹汤液》考[J].江西中医学院学报,2003,15(2):23-29,(3):27-32.

[11]张灿理,张增敏.张仲景医方与《汤液经法》考[J].上海中医药杂志,2002(7):8-10.

[12]李克光,郑孝昌.黄帝内经太素校注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:562.

[13]李茂如.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医经、经方之著录[M].见:李茂如,胡天福,李若钧.历代史志书目著录医籍汇考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4:19.

[14]黄龙祥.针灸甲乙经新校注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1990:1-6.

[15]张瑞贤,张作记.药王全书[M].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5:723.

[16]张增敏.张仲景医方的文献研究[D].山东中医药大学2004级博士研究生论文.

[17]陶弘景编,尚志钧,尚元胜辑校.本草经集注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4:24.

[18]杨绍伊原著,冯世纶主编.解读伊尹汤液经[M].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9:71.

[19]马继兴.中医文献学[M]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0:11.

[20]张灿理.中医古籍文献学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8:43.